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大学

A College Coursebook
for Practical Translation

实用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董晓波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大学实用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A College Coursebook for
Practical Translation**

主 编	董晓波					
副主编	杨昕怡	王 凡				
参 编	王娇娇	田 欣	王克飞	郑 毅		
	乔 楠	崔兆国	黄 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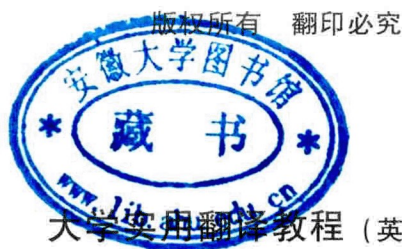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实用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 董晓波主编. —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ISBN 978-7-5663-0677-7

I. ①大… II. ①董… III. ①英语 - 翻译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645 号

© 2013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A College Coursebook for Practical Translation

董晓波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小平 王志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20.25 印张 467 千字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0677-7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37.00 元

序 言

在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大潮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产业正在兴起,时代迫切需要专业化、知识化、应用型的翻译人才。进入 21 世纪,翻译人才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是所有外语院系的紧迫任务。翻译人才的培养与翻译教学改革紧密相连。长期以来,以文学文体为背景的翻译理论指导着我国高校的翻译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跟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步伐,不利于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翻译人才。翻译教学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强调实用,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翻译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把外语专业等同于翻译专业,认为凡是学外语的人都会搞翻译,忽视了翻译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实,这两个专业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根本的差异。从教学目标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培养外语交际能力,在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技能中,“译”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手段。翻译专业教学则把翻译能力作为培养目标,从职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在双语交际能力基础上的翻译技能。从教学内容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学习语音、语法、词法、句法等语言基础知识,用单一的语言(即外语)去进行听说和表达,基本上不涉及双语转换机制。翻译专业则主要学习如何借助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翻译职业技能来对原语信息进行分析理解,并用译入语将所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双语转换机制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认知学、信息论、跨文化交际等多种学科,教学中应适当补充相关的内容。从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说,传统外语专业教学需要一个良好的外语交际环境,以利用各种手段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翻译专业教学所需要的则是双语交际环境,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教学资源,训练学生用一种语言来理解信息,而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相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翻译教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

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07 年 1 月通过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第 18 个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截止到 2010 年,全国 158 所大学设置了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本科设置对应翻译专业的英语院校有 400~500 家。《大学实用翻译教程》是英语翻译方向、翻译本科、翻译硕士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也是大学英语后续教学选修教材。

目前国内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翻译课所使用的英汉翻译教材大都沿用传统模式,将重点放在词语和句子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上,然而在实践中翻译者所面对的翻译材料一般均为较完整的篇章。撇开篇章而孤立地探讨词句的翻译是不科学的,因为同样的词句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由于情景、环境的不同,以及说话人或写作者的目的、意图、语气、心境等方面的差异,可以有不尽相同的意思,因而也有不同的译法。不言而喻,词句的

翻译必须放在篇章的大环境中来斟酌。本书将从全新的角度——文体的角度，坚持“实用、够用”原则，将语言技能与语言文化相结合，并突出实用功能的英汉互译材料。本书首先介绍英汉互译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对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进行了对比。然后以大量的实例介绍翻译的基本技能，并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从词、句、篇这三个层次介绍了英汉互译中的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在文体翻译中，该教材重点涉及和介绍了实用性强、与大学生今后工作相关度较大的文体文本，如信函、科技、商务、法律、新闻、旅游、时政等。

本书适用对象是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本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非英语专业高年级选修课。凡是正在从事翻译或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学习本书后，能对翻译的一些基本规律有所了解，有所遵循，从而获得教益，即提高自己的实用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本书由董晓波主编，杨昕怡、王凡副主编，田欣、王克飞、郑毅、王娇娇、乔楠、崔兆国、黄芳参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完美，但由于水平所限，不乏疏漏和欠妥之处，恳请广大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充实与完善。

董晓波

2012年12月

于南京东方城紫金山麓

电子邮箱: dongxiaobo@163.com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概述	1
第一节 中西翻译简史	1
第二节 翻译的性质和分类	9
第三节 翻译的标准及过程	11
第二章 语言、文化与翻译	17
第一节 英汉语言起源与特点	17
第二节 英汉语言异同点对比	19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差异	28
第四节 翻译中文化特色词的处理	32
第三章 计算机辅助翻译	41
第一节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前世今生”与前景展望	41
第二节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原理	45
第三节 主流软件的介绍及使用	45
第四节 翻译工具的使用	50
第五节 如何利用搜索引擎	52
第六节 最大化利用在线翻译	54
第四章 词语翻译技巧	59
第一节 词类的转换	59
第二节 增词与省词	64
第三节 词义褒贬与选词技巧	73
第四节 成语的翻译	77
第五节 习语的翻译	80
第六节 数字的翻译	85
第五章 句子翻译技巧	91
第一节 直译与意译	91
第二节 转态译法	93
第三节 正反译法	96

第四节	否定句的译法·····	98
第五节	英语从句的翻译·····	101
第六节	英语长句的翻译·····	110
第七节	汉语无主句的翻译·····	112
第六章	商贸翻译 ·····	119
第一节	商贸文体的风格和用语特点·····	119
第二节	商贸信函的翻译·····	124
第三节	信用证及合同的翻译·····	129
第七章	科技翻译 ·····	153
第一节	科技英语特点·····	153
第二节	专业词汇的翻译·····	157
第三节	常用被动式的翻译·····	160
第八章	广告翻译 ·····	167
第一节	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	167
第二节	广告翻译原则与方法·····	175
第三节	商标的翻译·····	179
第四节	企业宣传册的翻译·····	184
第九章	旅游翻译 ·····	189
第一节	旅游文体特点·····	189
第二节	旅游文体互译的翻译策略·····	192
第三节	汉语古诗词和名人典故的翻译·····	201
第十章	新闻翻译 ·····	211
第一节	新闻用语特点·····	211
第二节	新闻中新词和新造词的翻译·····	214
第三节	新闻翻译的要求与原则·····	219
第四节	英语新闻报道翻译时的时态处理·····	221
第十一章	法律翻译 ·····	225
第一节	法律英语用语特点与翻译·····	225
第二节	词汇、文化与法律翻译·····	236
第三节	法律英语常用句式及短语的翻译·····	239

第十二章 政论翻译	255
第一节 政论文体翻译综述	255
第二节 中国社会特色词的翻译	257
第三节 信息的准确传达	259
第十三章 影视翻译	267
第一节 影视翻译的特点	267
第二节 影视翻译的基本策略	269
第三节 电影标题翻译	270
第四节 字幕的翻译	274
第五节 文化信息的处理	283
第十四章 世界贸易组织(WTO)英文文本的翻译	289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WTO)概述	289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WTO)英文文本的语言特色	293
第三节 世界贸易组织(WTO)英文文本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303
参考文献	309

第一章

翻译概述

第一节 中西翻译简史

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依赖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也依赖相互理解，依赖翻译。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在出现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之前，翻译活动早就存在，但我们谈翻译史，只能从有历史见证的时期谈起。本节将着重介绍中西翻译历史的发展过程。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一、西方翻译史概况

截止到目前，西方的翻译前后曾出现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 4 世纪，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古代翻译活动活跃、繁荣的时期。公元前 3 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问世。公元前 250 年，罗马诗人李维·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将荷马史诗的《奥德赛》（Odyssey）译成拉丁文。这是有文可考的西方第一部译作。涅维乌斯（Eaevius）和恩尼乌斯（Ennius）则将大量希腊语戏剧作品译成拉丁语。此三人历史上称为罗马文学的三大开山鼻祖，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罗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很强大，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希

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聚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遵照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的旨意,开始着手将希伯来文《旧约》翻译成希腊文。最终翻译出来的译本被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这不仅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圣经》译本,也开创了西方翻译史上集体翻译的先河。之后,《圣经》翻译一直连续不断,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译本,其早期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哲罗姆译本。哲罗姆(St.Jerome)是早期西方基督教的权威人物,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他翻译过大量的希腊作品,但最有名的还是他翻译的《圣经》。公元383年,哲罗姆受当时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Pope Damasus I)的委托,先后译出了《圣经·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以及《旧约》中的《诗篇》、《约伯记》等篇章,后来,他又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圣经》全书的翻译,取名《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这部译本得到了罗马天主教的承认,成为定本,在西方影响巨大。

中世纪中期,即11至12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公元9至10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

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学者对阿拉伯文化萌发了极大兴趣,开始将阿拉伯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包括大量原来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作品。当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译者中既有欧洲的学者,也有阿拉伯的学者,二者之间有很好的合作。大主教雷蒙(Archbishop Raymond)创立的托莱多学校是当时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机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汇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也使托莱多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翻译中心。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是欧洲历史上划时代的大运动,为思想、文学、哲学、宗教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空前活跃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家阿米欧先后用了17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洛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一本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五阶段发生于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 and 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

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译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

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阶段是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二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广度和规模方面都远远超出此前的任何时期，而且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首先，同以往翻译活动重点是文学和宗教作品不同，现当代翻译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政治、科技、商业、外交、法律、学术等众多领域，而且这种实用性的翻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文学和宗教翻译。如果说此前的翻译主要还是文人雅士从事的工作，那么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和文化交往的迅猛发展，翻译已经成为大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了。

其次，翻译活动呈现出组织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以人文领域为例，欧美出版了大量系列翻译丛书，如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名著丛书》(*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丛书》(*Translation Collection*)等，均系统地收录了世界各国的名著英译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也以本国文字出版了类似的丛书。此外，二战后，西方各国创立了大量专门登载译作和交流翻译经验、开展翻译理论研究的杂志，如美国的《美国译协通讯》(*ATA Notes*)、英国的《翻译与文学》(*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法国的《翻译》(*Traduire*)等等。

最后，在翻译方式上，出现了机器翻译这一革命性的翻译方式。从1993年苏联的特罗扬斯基和美籍法国人阿尔楚尼提出了“机器翻译”的主张并获得专利以来，机器翻译经历了高潮与低谷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翻译，特别是计算机辅助翻译(CAT)，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在商务和技术领域，已有了大规模的应用。

二、中国翻译史概况

翻译在中国也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据我国翻译史研究专家马祖毅推测，我国在夏商时代就应该有翻译活动。《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有这样的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如果说这一段史料尚未明确提到翻译，不足为证，那么《周礼·秋官》中关于周王朝翻译官职象胥的记载则有力地说明了我国翻译活动的历时之长(马祖毅，1999：1)。象胥是负责接待远方来朝使节的大行人的属官，按照清朝梁章钜《称谓录》所言，象胥“掌传达异国来使之语言”。从这段记述看，当时的“象胥”职责就是翻译。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汉代—符秦时期；隋—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五四时期及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南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

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84 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 30 多部佛经。后来月氏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 10 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翻译佛经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氏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 175 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支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 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 49 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享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翻译的繁荣时期，此时佛经翻译活动历经 500 余载也达到其极盛时期。当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封建社会也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擘玄奘，他为佛经翻译添上了最为浓重的一笔，使佛经翻译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玄奘（600—664），本姓陈，名祜，河南人，13 岁出家，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中国家喻户晓，与鸠摩罗什和真谛一起被誉为历史上的三大佛经翻译家（也有人将不空大师和他们放在一起，称为四大“四大译师”），而玄奘理所当然地推为大家之首。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到达印度之后多次参加有关佛学的辩论，所向披靡。他留印 17 年研讨佛学，成就斐然，此后载誉归国。

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他翻译经文数量巨多。玄奘从印度取回梵文经典 657 部，19 年间共译出佛经 75 部，共 1335 卷，过唐代译经数之半，实乃空前之举。其次，他开启了佛经翻译新译之先。玄奘译风严谨，文笔精练，将翻译的标准与意译、直译等重大问题在实际译作中得到空前的完美体现。他深谙佛理，精通华梵，翻译时采用了多种技巧如补充法、省略法、分合法、变位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佛教史将玄奘译经称为“新译”，其前则称为“古译”与“旧译”。其译文质量亦成为空前之举，为历代所称道。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

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诏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从那时起,我国翻译事业已经从佛教翻译转向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译介。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到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间,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纾(1852~1924年)开始翻译小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所以林纾被赞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之后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七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两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五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与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进行翻译,而且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下笔如飞文不加点,使得许多文人才子大加赞赏。胡适说“林纾译出的速度四倍于我”,康有为写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严复,林即指林纾),茅盾说“除了几个小错误,颇能表达原文”。钱钟书于20世纪60年代重新阅读了林译的小册子,说仍然勾起了童年时代的幻想,“很多都值得重读,与其读‘准确’的译文,还不如读林纾的译文,保留着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严复是清末另一位很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

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他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以也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25岁到英国留学,热衷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回国后,他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经济方面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律方面的《法意》(*On the Spirit of Law*),政治方面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学方面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伦理学方面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传播广泛,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译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入中国。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1902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1897年孙宝瑄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与本国思想发生影响的第一人”。

此外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他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国家的落后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西方先进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科学技术唤醒蒙昧无知的国人。一大批知名的

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学者和翻译家广纳博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科技著作,在中国翻译史上掀起了另一次翻译高潮。在文学翻译方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梁实秋、周作人、傅雷、刘半农和巴金等人。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鲁迅也做了大量的翻译,其译作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在鲁迅的翻译作品里,一大半都是俄国及苏联的作品,如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的《桃色的云》、《世界的火灾》,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死魂灵》、以及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的《毁灭》等。此外,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小路实笃(Saneatsu Mushanokoji)的《一个青年的梦》、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的《苦闷的象征》,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鲁迅的这些译作多半是革命的文学作品,目的是为当时正在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人民提供精神上的鼓舞。

大文豪郭沫若同样译著等身,早在1917年左右即开始翻译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和海涅(Christian Heine)等人的诗作。1921年,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立了创造社,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其代表译作包括德国施笃谟(Theodor Storm)的《茵梦湖》、歌德(Wolfgang Goethe)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华伦斯坦》,日本河上肇(Hajime Kawakami)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俄国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新时代》、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英国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争斗》与《法网》以及美国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石炭王》和《屠场》等。

在这一时期,我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艺理论的翻译,如《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这些译著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的翻译学者有傅雷和钱钟书。

傅雷,上海南汇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他13岁攻读法文,曾经在巴黎大学和卢浮美术史学院学习。他提出了“除了专业的修养之外,译者全面的学识修养对翻译的极端重要性”。傅雷译作名闻海内外,其翻译理念是“神似论”。他在《巴尔扎克〈高老头〉重译本序》里开篇点题:“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全文几乎都在以“神似说”这个中心展开论述。10多年后,傅雷又

^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向外国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这方面最成功的当属林语堂。林语堂英文造诣极高,长期在欧美生活。他用英语创作了一系列轰动欧美文坛、影响深远的作品,并将《论语》、《老子》、《庄子》、《浮生六记》等优秀中国文化作品译介给了西方读者,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1963年1月6日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可见傅雷对他的“神似”说翻译论从未动摇过。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说“神似神韵之说，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论战时，不是没有人提过，但是这样宣言式的以传神标榜，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是第一次（金圣华，2006：58）。傅雷为了能使他的翻译传达出原作之神韵，实现“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统一，可谓在译前、译中、译后的整个过程中都做足了功课，用力极深。译前，他强调要审慎选择原作，并将之吃透。他在翻译中为传原作之神韵，实现神似与形似的和谐统一，又常假定译文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以克服在翻译中不利于传神的因素。译完后，他又会不满足而反复修改。他的“神似论”即便是在现在的翻译领域当中，也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他的翻译观的学习与研究也具有现代意义。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艺术，代表作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同时，他对翻译理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在翻译学上的成就只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雕栏”，但对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论”的观点。他的这个观点是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陈福康，2000：76）。他的这一理论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受到了翻译界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文科学百废俱兴。翻译研究的主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一致的，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中国翻译》杂志诞生了，它系统地把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例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论”等，促进了翻译在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国翻译界，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是百花齐放。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翻译诗歌“三美论”，即翻译要达到“音美、意美、形美”才是好的译文，北大教授辜正坤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论”等等，同时还有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把中国的四大名著翻译成了英文，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的翻译事业正朝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在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化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开始学习翻译，研究翻译。而此时，翻译也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非文学翻译在市场上占据广阔的前景，诸如政治、经济、化工、机械、法律、金融等等，各行各业当中都涉及到了翻译。现在的译者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更要懂得专业背景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译者，一定是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兼备良好的背景知识，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磨练，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人才的。

第二节 翻译的性质和分类

一、翻译的性质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它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交流沟通的纽带和桥梁。然而由于翻译的形式和内容相当纷繁复杂，从中抽象出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翻译的定义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重任。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活动做出了概括和总结。

1. 翻译的定义

翻译始于原始人类以不同的语言进行交际之时。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翻译是利用双语（或多语）转换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实践，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和学习的重要手段。那么，什么叫翻译呢？这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代替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卡特福德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

“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奈达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吕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翻译定义的不同见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翻译的题材不同，目的互异，读者的要求也往往不一样；同时，各种语言都在不断发展，文体特征也随之变化，为某一时期读者所接受的译文不一定就能为另一时期读者所接受。

归纳起来，所谓翻译，是指用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是指从语义和文体风格上，在译文语言中采用最接近而又自然的同义语再现原文信息。

2. 翻译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国内外翻译界一向存在着“科学派”和“艺术派”的分野，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翻译界还掀起过“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之所以称翻译为科学，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语言中有些东西已经标准化，往往只允许一种译法，如科技术语一般只有一个译名，还有些常用的比喻、成语、谚语、惊叹语、各个领域的典型用语等等，也都只有一个固定的译法；二是翻译是有规律可循的，拿英汉翻译为例，译者若能熟知这两种语言的特点和异同之处，就能找到其内在的规律和联系，从而归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做起翻译来才能得心应手。我们之所以说翻译又是艺术，是因为语言中有些东西无法标准化，允许有各种选择、各种译法（林煌天，1997：1071）。1954年，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有可能超过创作”（罗新璋，1984：498）。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翻译的确有其科学性和艺术性。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是带着镣铐